

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你是昂首高亢的雄鸡——
唤醒拂晓的沉默，
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
叱咤时代的风云，
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
舞动神州的雄风，
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
点燃文明的星火。
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
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坚强的性格挺拔起泰山的气魄，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的寄托。

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
我自豪你的精神，
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祖国颂

钟国新

我的祖国，
可爱的中国，
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

我自豪你的悠久，
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我自豪你的坚强，
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

我自豪你的光明，

可爱的祖国啊，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
无论我身居何方，
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灵。

可爱的祖国啊，
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
你用速度，你用实力，
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
你用勤劳，你用智慧，
进行了又一次更加辉煌的开拓！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充满希望，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朝气蓬勃！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涛，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黄色的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黑色的眼睛流露着谦逊的笑窝，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天堂电影院》

翟维纳

《天堂电影院》，是52部电影的阅读笔记。里面的一篇篇笔记，好像许多最后见到的那些一幅幅的电影片段，是捕获了这些光与影的交响，用文字的方式将其丰厚起来。阿简曾在《天堂电影院》里这样说：“每一种分析对电影而言，都是一种损害。因为分析使电影狭窄化了，电影永远有文字无法说清的内容。那些内容将只附着在电影胶片上，只有通过观看才能获取。”

如她所言，用文字剥离电影，好比用电影提取生活一样。因为文字或者影像的局限性，总是不能照顾到全貌。可是，这些局限性依然无法影响我们对文字

对电影的喜好。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身，忘记自己的处境。会轮回到电影中的人物里去，感受他的喜、他的怒、他的哀、他的乐。本质上，电影已经将生活中的某些场景深化。其实，正如电影可以深化生活一般，用文字解说电影，也是对电影的一种深化。通过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窥到电影的风貌，甚至是更为便捷地穿透电影，直指人生。从这个角度讲，文字对于电影可以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用文字和光影的形式将生活雕刻成一面镜子，让藏在暗处的眼睛，也总是期待一线光明：光亮轻轻启开的眼眸，漾到丝丝缕缕织成的幕布背后，可以轻轻拥抱或者忧伤片刻的生活。

家族的上一辈中，有叔伯弟兄十几个，在建国初期的工农商学兵五大行业都有，但最响亮的当属五伯王文喜，他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有着传奇的人生。

五伯个子不高，块头不大，相貌平平，从现在他年迈的身姿上看不出当年他是一位冒着枪林弹雨为革命出生入死、叱咤风云的战斗英雄。问及当年的英雄事迹，他一般不愿开口，上级慰问老革命，若忘了他，他也毫无怨言，问起他的委屈，他总说：“当年那么多战友为了新中国都牺牲了，自己能活到现在，看到祖国一天天强大就很知足了，人哪能计较这些名利呢？”

五伯是1947年参加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跟随陈毅、粟裕这样的开国元勋南征北战，鏖战华东，逐鹿中原，先后参加了开封战役、淮海战役、大战于沪杭，从一个战士成长为连长，他所在的部队要么担任尖刀、主攻，要么穿插迂回，千里奔袭，断敌后路，与夺路而逃的强敌激战，多少次，所在的团、营、连伤亡过半，时隔几十年，他回忆道：“淮海战役中有一名排长早晨刚提为副连长，晚上就不幸牺牲了。”“那个年代，睁开眼睛就是执行任务，站起来就是行军，卧倒就是打仗，几乎没空想其他事，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咋完成首长下达的作战任务。”

五伯曾任侦察连连长、尖刀连连长，是最能打、最有战斗力的连长之一。全国解放之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五

伯没有写信征求家人意见，踊跃报名参战，从大上海急调到东北，经过集结、训练，战前动员，部队整编，调配武器装备后，一夜之间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了为期三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

五伯仍是打先锋，担任先峰部队的先锋官，是一员勇将，担任27军机枪连

徽文

英雄人生

王镜宾

连长，身负数十公斤枪弹，带领连队一百多名勇士，多次翻越白雪皑皑的大雪山，迂回到“联合国军”侧后，断敌退路，切断被围美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在没有空军、炮兵、坦克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在敌后顽强阻击敌军，先后完成了五次战役赋予的战斗任务。由于遭受敌军优势炮火打击，全连遭受了重大伤亡，五伯多次泪洒战场。

“记得有一次冬天翻越朝鲜大雪山时，山顶零下四十摄氏度，我们虽然穿着棉衣，但手上没有手套，爬山流的汗水很快冻成冰，一些战士没有及时松开抓枪械的手，结果手指头粘在枪身上冻僵了，麻木了，一用力挣脱，手指头一节节全断了，血流出来，一会儿就凝固了……一些人疼死在山上，一些人冻死在

路上，活着的也都被截肢，好多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一下子变成了残疾人了，让人心痛啊……”五伯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最后他说：“我这个当连长的有责任，对寒冷估计不够，没有及时向上级申请防寒物资……主要是我一直在华

古瓶

陈永林

这古瓶哪来的？真的这么值钱？父亲激动得声音都抖了。

娘家陪嫁的……这古瓶，我先保管。店办不成了，就找我。

因为有了这古瓶，母亲同意父亲开饭店。

父亲找亲朋好友借钱，却不如意。父亲就想先卖掉祖母手里的那只古瓶。祖母不依，还训了父亲一顿。但父亲不死心，一回趁祖母不在，

拿了古瓶去了古董交易市场。不知为什么，父亲亲没卖古瓶。父亲把那古瓶又偷偷地放回祖母房里。

父亲就在银行贷了款。饭店如期开张了，生意却没想象的那么好。后来，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再这样下去，本钱全得亏光。

又有入讨债。母亲对父亲说，这饭店关门吧……我们求求那古瓶卖了，还清债，再干些踩蹬人力车等力气活。

父亲说，这饭店不能关门，一关门，几千块钱就全扔水里去了，水漂都不打一个。我想我们还是改卖快餐。现在的人生活节奏那么快，没时间等炒菜……再说，那古瓶娘不肯轻易出手，我也跟娘说了，她还骂我是败家子，说不给饿死她分上，这古瓶绝对不能卖。祖母想把那古瓶当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

改卖快餐，又要投一笔钱。只有再贷款，我去古董市场转过，娘手里的那只古瓶能卖三万多块钱。父亲又从银行贷了款。可没多久祖母去世了。祖母临死前当着母亲的面拉着父亲的手说，这古瓶就传给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这古瓶。父亲流着泪答应了。父亲把古瓶锁在柜子里。

金融危机，厂子效益不好，父母都待业了，一家人的生活没着落，父母急。父亲说，我们也开家饭店，如今饭店的生意还好。

母亲不同意，开饭店至少得上万块钱，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去借。

若饭店办砸了，拿什么还？到时一家喝西北风去？

后来父亲同母亲商量过几次，母亲仍不同意。

这天吃晚饭时，父母长吁短叹时，祖母来了，祖母手里拿只粗瓷花瓶，说，我想你们开家饭店，没钱先可借钱。如饭店万一办砸了，就拿我这古瓶卖，这古瓶市场上卖两三万块钱。



深山小镇 吴明



陆佳

这天，他们几个人顺着陇海路一直朝西走了很远，直到天黑的时候，才回到陇海大院。高新高在屋里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出门了，这次在外面转悠得特别开心。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流逝着，很快就是1979年10月了。

10月22日，这一天高新高不会忘。

这天上午，邱仲慧、常三、许兰生等人背高新高下楼准备出去转转。

邱仲慧说：“三哥，这回该我背你下楼了。”说着，邱仲慧在高新海的床前蹲下身子。

许兰生说：“仲慧，看你瘦得干柴样，能背动三哥不？”

“废话，我又不是没背过，来，背住走。”邱仲慧说。

几个人帮着把高新高弄到邱仲慧的背上，邱仲慧背起高新高就出了屋门，顺着楼道向一楼走。

邱仲慧这天穿的是白胶底布鞋，走路时脚底下有些滑，而长长的楼道也有些滑，他背着高新高走到楼道中间时，脚下踩着一个石子一样的东西，就控制不住滑了一下，身子猛然一歪，高新高就从仲慧背上摔到了楼道的水泥地上。

许兰生等人见此情景，赶紧跑过来，围住高新高，问他有没有事没有。高新高摇摇头，说：“应该没啥事吧，反正我这腿没感觉。”

几个人以为高新高真没事，将高新高又背下楼，架住他又在院里锻炼身体。可当锻炼结束时，高新高发现自己的右腿格外粗，用手一摸，确实比左腿粗，高新高就知道坏了。

几个人将高新高背回二楼的家里，将他放到床上后又帮着把他的裤子脱掉，看看他的右腿到没有完全长齐了。大家一看，高新海的右腿已经是红肿大发了，众人猜想，高新高不是摔住骨头了，就是摔住肉了，反正这次摔得不轻。

中午的时候，杨继增的母亲李大夫下班回来了，听说高新高在楼道里摔了一下，就急忙忙从家里赶到高新高家，看了看高新高的情况，她说90%的可能是摔骨折了，要

找个骨科医生好好治治。

当时郑州乃至河南在骨科方面比较有名的医生就是郑州市骨科医院的院长郭春元。郭春元一般情况下是不出诊的，为了能让郭春元来陇海大院给高新高看病，李大夫通过关系托人找到了郭春元，将高新高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郭春元讲了，感动了郭春元。最后，郭春元亲自到高新高的家里给高新高看病。

郭春元是洛阳正骨的传人之一，有着十分高超的医术。他捏了捏、敲了敲高新高的大腿，断定高新高是大腿骨折了。

郭春元断定高新高是骨折后，说明了治疗的意见：一、根据高新高的病情，应该住院动手术治疗；二、作为高新高这样瘫痪的病人，住院动手术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即便动了手术将断骨接上，他也不能下地走路，动手术没有实际价值；三、用石膏绑腿，让骨折的地方慢慢愈合，只要断骨能长到一起就行，这样既省钱、简单又实际。”

高新高同意第三种方案，大家都赞成第三种方案。

郭春元说：“其实我的意见也是采用第三种方案，既然你们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我就按这个方案治，保证将他的腿接上。”

就这样，郭春元亲自为高新高在大腿处打了石膏绷带，并嘱咐高新高不要轻易动右腿，动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动。

人常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高新高的腿在名医郭春元的亲自治疗下，两个月后，大腿的断骨终于长到了一起。据郭春元讲，因为病号可能是因为翻身或怎么地动了骨头，断骨的地方没有完全长齐，不是十分理想，但对高新高来说，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不错的。

高新高治腿这段时间，孟宪生、邱仲慧、王家新、孙豫生、樊跃、许兰生等人为高新高干了一件难忘的事，他们决定在一楼的空地上为高新高盖一间房子，让高新高住一楼，解决其来回上下楼的不便。

盖房需要砖、需要沙、需要水泥，为了解决砖的问题，几个人拉着架子车在郑州转悠，发现哪里有人家扔的废砖或工地干活剩下的少量不要的碎砖碎沙，就用架子车往回拉。拾砖毕竟是有限的，大家又找来脱坯的坯斗，用架子车从郊区拉来一车一车的土，和了泥，大家轮流用坯斗在陇海大院里脱坯。

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

连载

在庆王府的演出和祈祷

我父亲很喜爱中国传统京剧，每星期天都带我们去看戏。回来后，我们几个孩子就试着模仿，自己演京剧。有时也杂耍。我们通常选武戏，因为我们都受不了唱唱那部分。最喜欢的剧目有《大闹天宫》，还有《武松打虎》。我们兄弟五个自己设计服装搞化妆，有时候特殊场合，我们的两位姐妹也会参加。我们开始这些演出时我也就七八岁。

我们请邻居来看，收他们一人一个“大子儿”。他们中有些是很有学问的教授，所谓大知识分子。过年的时候，英家其他几门的堂兄表亲也会来看演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演员，我的兄弟姐妹们实际上是在为我打工，因为我同时还是经理或是制作人，组织演出，发演员包银。过年大人给每个孩子红包，里面装钱，所以我们每人都得到点压岁钱。演出后给每位兄弟姐妹发完工钱，我就成了孩子中最穷的。但我知道我在母亲面前要耍点小脾气就能把钱要回来。

他的曹魏灭了其他两国。

我父亲不但培养了我对中国戏曲的兴趣，还给我介绍了西方的戏剧以及有特定风格的体育形式，如拳击。日本人开始好奇，把我们的练习画下来。我父亲知道了相当紧张。苏老师编的这些身体锻炼的练习是我接受的最早的形体训练。

我父亲那阵儿学着写剧本，一些哑剧的小品，用来加强这种哑剧训练。我记得那还不错，是根据查理·卓别林之类的艺术家而创作的，我很喜欢演给他看。

我最早的表演经历是在北堂里当祭坛侍童。我们教区的牧师是最先雇我在不同弥撒里进行独唱。作为祭坛侍童，我对拉丁文的祈祷和赞美诗背得滚瓜烂熟。尤其出色的是我那清脆嘹亮的童声高音。我们家这么多兄弟，我是唯一在弥撒中唱歌的。原因很简单：钱。教区牧师见到我就会笑逐颜开，摩擦着双手。把我拉到一边，付我一个铜钱在婚礼或葬礼弥撒上唱圣诗。我的艺术创作就值这么多。

“为什么不高兴？”她会低头问我，“过年了，人人都高兴，你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别问我！”我嘟囔着。

“过来，跟我说实话。”她会说。

我就会回答：“我的钱都给了大哥，二哥，我自己没钱了！”

“什么？”她难以置信。

“他们说演戏就要给钱。”我解释道。

我母亲大发脾气，把他们全都叫到面前。

“你们拿了她的钱？”她责问道。他们只能回答：“是，可那是我们演戏的……”

“胡说！”她大声说，“把钱还给他！”

所有的钱都又回到我的手上。

不用问，我的兄弟姐妹们对我非常生气，恨不得杀了我。但这其实是一报还一报，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演戏的钱。他们拿了钱也没什么东西买。他们就是想坑我一回，反而让我给坑了。

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需要买通他们。我会说：“如果你答应演猪，我演猴，我就给你钱……”因为我每次都演孙悟空。

可以说我当时就干上导演了，给自己分了个男一号的角色。兄弟们都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小曹”，意思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因为他是在三国里最狡猾多智的，最后就是

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要买通他们。我会说：“如果你答应演猪，我演猴，我就给你钱……”因为我每次都演孙悟空。

可以说我当时就干上导演了，给自己分了个男一号的角色。兄弟们都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小曹”，意思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因为他是在三国里最狡猾多智的，最后就是

水流云在



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圣心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